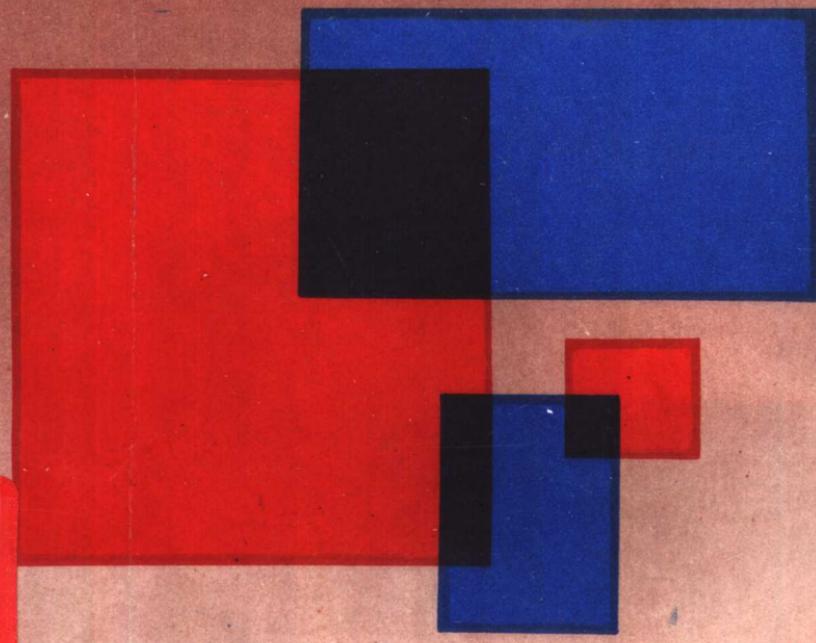


# 城市改革 实践的探索

郭元晞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城市改革实践的探索

郭 元 睞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6年·成都

## 城市改革实践的探索

郭元晞

---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安县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4298·77

ISBN7—5364—0096—9/F·16

---

1987年2月第1版 开本787×1092毫米1/32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0千

印数 1—3000册 印张12.75

定 价：2.15元

## 前　　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行了整整八年。改革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在农村，改革可以说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胜利的重要标志，就是广大农民切身的经济利益已与他们的生产经营好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城市，虽然我们也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突破，但由于城市的各种经济关系非常复杂，遇到的各种障碍很多，新旧体制仍在较量，旧体制还相当顽固，改革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还需要人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这样，进一步了解城市改革的历史和现状，也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本文集，收集了我在近些年来写下的文章的一部分。重点突出的是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四川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介绍；二、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历史和现状；三、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研究；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探讨。

在四川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介绍部分里，主要是叙述了一九七八年四季度至一九八一年底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各种改革，包括四川工业的改组与联合。收入这一部分，是考虑到现在国内外不少学者和关心改革的人们，对四川省改革中的那一段历史非常重视，四川的那一段历史在全国经

济体制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历史和现状部分里，较全面地介绍了一九八三年二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由来，试点的主要内容和作法，试点的发展情况。重庆的改革在我国整个城市改革中是很有代表性的。它的改革模式目前已为我国许多城市学习。收入文集的几篇关于重庆改革的文章，对重庆改革的介绍是比较完整的，读者从这里可以大体上了解重庆改革前三年的主要情况。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从一九八六年下半年开始，重庆在深化企业改革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新的经验，可惜本书来不及把这些内容都收进去了。

在发挥城市经济中心作用的研究部分里，实际上也是要以重庆改革为背景的。不少是作者比较早地对城市改革的理论模式进行的一些研究。有的观点当然不一定是很成熟的，但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新兴的学科，目前尚在初建之中。收进去的几篇文章当时在国内有一些影响，也曾为一些报刊转载摘登。我想现在如能对从事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同志起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就很不错了。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探讨部分里，涉及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问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的自留资金性质问题），社会主义个人消费品分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学术界目前仍是有较大争论的。作为一家之言，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愿意把它们奉献给广大读者，以为研究中的参考。当然，有不少问题对我自己来说还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继续探索。我相信在经济体制改革这场历史性的转变中，我国的社

会主义经济理论会有一个巨大的发展。

我是经济理论战线上一个十分幸运的新兵。其所以是幸运的，首先是在我开始经济理论研究生涯之日，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起步之时，也就是说，我所从事的经济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本文集，就正是近些年来，我在参加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所进行的一些探索。其次是我的生活、学习、工作一直在四川，而四川既是赵紫阳同志曾直接领导最早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地方，也是改革难度最大的地方。从四川改革一开始，我就参加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等一系列重要活动，这对我的理论探索无疑是极为有利的。第三是我所在的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有一批同志是积极的改革者，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在国内外以研究改革闻名的经济学家林凌同志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很多指导。我所进行的探索与他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最后，我感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决定为我出这本文集。这对我今后的继续探索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和鞭策。

## 目 录

前言 .....	( 1 )
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 .....	( 1 )
四川省1978—1981年经济体制改革	
试验的回顾 .....	( 28 )
四川工业的改组联合 .....	( 70 )
重庆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简介 .....	( 95 )
一条搞活经济、发展经济的光明之路	
——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一年回顾 .....	( 112 )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阶段	
——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三年回顾 .....	( 128 )
试论经济中心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	( 179 )
从重庆看中心城市的政府怎样管理企业 .....	( 190 )
中心城市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探讨 .....	( 200 )
论生产力布局与经济中心城市 .....	( 211 )
试论经济联合与所有制的变化 .....	( 224 )
略论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的发展变化 .....	( 234 )
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四权”	
不能截然分开 .....	( 242 )
论社会主义国家与企业关系的二重性 .....	( 249 )
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自留资金 .....	( 266 )

让一部分企业和工人先富起来.....	( 279 )
工资改革要从我国现阶段按劳分配的 特点出发.....	( 293 )
按劳分配原则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	( 301 )
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个人消费品分配.....	( 314 )
论产品税.....	( 334 )
“利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辨.....	( 347 )
谈谈随行就市.....	( 353 )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	( 358 )
深入改革必须进一步打破传统观念.....	( 374 )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必须根本 改革.....	( 389 )

## 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商品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已开始近七年时间了，近七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在讲重大突破以前，我想简单回顾一下我国从建国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所走过的道路。

我国的经济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止，这段时间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第二阶段是从大跃进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在不断的变化中；第三阶段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三个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阶段，从建国初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是这样一个情况：农业当时是由地方管理，国家对农业生产是指导性计划。一九五四年起，开始对农副产品的购销实行指令性计划。从工业看，建国初期到一九五三年，工业生产由各大区工业部直接管理。一九五三年以后，开始对国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统购包销。从基本建设看，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成功地建设了一百五十六个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是由工业主管部门安排，集中在中央，地方主要搞一些农业、水利、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包括文教、卫生，大的项目仍需由中央来指令。

财政方面，从建国初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都是集中在中央，实行完全的统收统支，从一九五四年开始，建立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当时叫做划分收支，一年一变，自留余地，结余上缴。物资管理方面，由中央各主管部为主，实行归口安排，按条条分头供应。商业管理方面，主要是吸取当时老解放区的一些作法，以国营和供销社为主体，从中央到县系统地建立了各种专业公司，实行垂直领导，统一核算。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从建国到一九五七年，我们是在集中管理的同时，由于各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较好地利用了经济杠杆，发挥了市场经济的作用。具体表现是：国家对工业企业按照不同的行业、不同的比例实行奖励基金。对物价实行分级管理，中央管主要品种，大部分品种则由省、地、县管理，中、小土特产品根据市场供求实行议价。另外，国家对私营工商企业采取征收所得税和营业税的办法，而对国营企业采取征收工商税的办法，对合作社实行扶持发展的税收政策。同时，全国范围内划分了不同的工资区，工人实行八级工资制，推行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相结合。这是第一个时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最初的经济体制的形成时期。

我们讲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不回顾过去的历史，不能不追究过去体制形成的原因。那么过去这样一种体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研究，过去这种体制的形成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原因。前一段时间，理论界有很多同志把我们过去体制中的一些不合理的部分，统统归咎为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这个看法是不很科学的。这五个方面的原因是：

1、我们按马、恩、列、斯的理论进行了暴力革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情况下，实行高度

的集中统一的体制，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产物。

2. 我们过去体制的形成，是教条地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经济模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对社会主义社会，即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作了若干设想，这些设想后来成为我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是从当时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的情况，提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同时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地方取得胜利。但马、恩这个论点后来很快就被列宁发现是需要加以纠正的。列宁在他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这本书上，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同时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只能首先在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这样，取得胜利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到底怎样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就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不同了。这一点，我们没有作认真的分析，而是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把马、恩一些书本上的东西照抄下来，用以指导我们社会主义的实践。

3. 由于长期的战争，我们整个的国民经济已经濒于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武装干涉和颠覆，我们需要建设一大批骨干企业。为此，财权、物权都必须高度集中在中央，以保证重点建设。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后来我们也没有对此作具体分析，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哪些是该坚持的，哪些是该随事变化的，没有得到明确。

4. 过去这一套体制的形成，又是在我们过去的根据地那些经验影响下的产物。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根据地为了

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包围，采取了自给自足的方针，采取了一定程度上“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在管理企业方面也采取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一些作法。全国解放以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但我们相当一部分管理人员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他们将过去那种管理方法转移到了新中国。这种管理方法有它积极的可取的一面，但也有它局限的一面。

5.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在新中国建立时，苏联已有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他们在许多方面在当时是成功的，因此，我们为了少走弯路，也确实学习了苏联的许多作法。这样，过去经济体制的形成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学习苏联经验的产物。

完整地、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过去的体制，主要有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它们不是孤立的，也不是有些同志所说的单纯照抄照搬苏联的，它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特点。这是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形成，从现在来看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弊端，我们现在经济体制上的很多弊端也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但历史地看问题，这种经济体制在当时又确实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使我们当时的经济发展相当迅速。所以，对五十年代的经济体制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第二个阶段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这个大的阶段一共经历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总的特点是：我国整个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分权～集权～再分权～再集权的几次反复。如果再细一点，可以分为这

样几个小阶段。一是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〇年。这一段我们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提出的“三面红旗”的需要，采取了下放企业、扩大自主权的作法。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当时我们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当时下放了一大批中央企业到省、地、市、县管理，而以后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以从一九六一年起又开始收。二是从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当时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一段基本上属于经济上第二次恢复时期。一九六四年以后又开始下放一部分企业，这中间吸取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期的教训。所以这一阶段我们搞的经济建设和下放企业有它成功的一面。尤其是当时在四川进行的大三线建设，比较注意了地方和中央两个积极性，有着许多好的经验。但好景不长，后来紧接着文化革命开始，这个体制就被彻底打乱了，到一九七〇年江青指出打倒条条专政，一九七三年又开始下放企业。这样一来，我们的经济体制就面临着一会儿下放、下放不行又上收、上收不行又下放的时反时复，时此时彼的状况，有的同志比较形象地将这一时期概括为十六个字：“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又死”，形成了恶性循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二十一年的历史中，我们曾经历了两次大的政治上的混乱，这两次大的政治上的混乱是相互联系的。这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变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中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发生在这二十一年的过程中。以这两次政治上大的动乱为标志的一整套“左”的思想影响都直接贯穿到这二十

一年的历史中。所以，我们的经济体制不论怎么变，基本上可以说它始终是左的思想的产物。

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由于“左”的一整套东西的严重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其间，虽然我们也进行了几次改革，但回过头来冷静地看一看，就不难发现我们过去这二十多年变来变去，但经济体制不仅不能真正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而且矛盾越来越深。主要原因是：

1. 我们过去二十一年中经济体制的变革始终是围绕着谁管企业来做文章，围绕着由中央管还是地方管来做文章，而不是围绕着调动企业自身积极性来做文章，这必然导致过去二十一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失败。围绕着谁管企业来做文章的实质，说到底无非就是对企业进行争夺。一个企业，中央想管它，省也想管它，市也想管它，互相争夺，实质上是互相争夺利益。因为中央和地方的利益不大合理，中央、省、地、县的利益不合理。所以大家都想争那些“油水”大的企业，而不想管那些“油水”小的企业。作为企业来说，也想挂靠一个大的靠山，管理部门的权限越大越好。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央企业分配的原材料、资金要多一些，省的企业又比市的企业多一些。

2. 二十一年中，经济体制改来改去，企业始终处于行政附属物的地位。企业一没有明确的经济责任，二没有必要 的经济权力，三没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是一个任人随意拨动的算盘珠，缺乏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因而也不可能具有活力。

3. 二十一年中，经济体制变来变去，条条块块的关系

越搞越乱。最早的企业是由各大区的工业部门管，后来变到地方，再后来又上收。形成了各种隶属关系的企业非常多。有的条块不好划就发明了其它一些名目的管理办法，后来又发展为省属市管、部属省管企业，多种名目的管理方式都出来了，多头管理，使企业有无数个“婆婆”指挥它，企业无所适从。

4.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也变来变去，而变到底就是要不断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包括农村人民公社，过去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然后到人民公社，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有程度越高越好。集体经济受限制，个体经济被取消，不是越来越合理，而是越来越脱离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状况。

由于这四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我们现存经济体制的弊端。正如赵紫阳同志在四川视察工作时指出的：“我们的经济体制表现为两个缺点，一个是死，一个是懒”。企业搞死了，没有活力；劳动者搞懒了，没有积极性。

第三个阶段就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理论有所怀疑。这一时期，比较大的事件是在我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一次思想战线上的拨乱反正，使人们从狂热的状态中冷静下来，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打开了和外界联系的大门。这样，一旦跟外国有所接触，就发现我们自称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要求所有国家都要走我国的道路，是非常可笑的。我们终于发现实际上有很多很小的国家都远远走在了我们的前头。我们很多同志由于处在长期的封闭中，一走出去就吓了一跳。发现包括新加坡、台湾等都发展得非常迅

速，甚至包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如西德、日本）。当时他们的基础并不比我们解放初期的基础好到哪里去。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许多同志开始对我们的现行经济体制有所怀疑。对我们标榜自己是最革命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开始怀疑。发现我国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人民生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而且，人们也终于意识到，这一切又都与我们不合理的体制有关系。

于是我国派了许多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到南斯拉夫和东欧去考察，发现从南斯拉夫到东欧各国，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济发展比较迅速。这样，就开始提出要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

最早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时，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实践走在理论的前头。当时只是从现实经济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出发，首先在农村搞了扩大生产权，然后到划分作业组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并未提出较系统的理论。在城市，尤其是从四川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这时也没有比较充分的理论根据，理论界争论很大，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来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四川来说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四川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开始，对六个地方工业企业实行扩权。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已经基本上形成。到一九七九年初开始，四川省进行了一百个工业企业的扩大自主权试点。四川省下达了“十四条”文件，主要内容是实行计划内利润留成和超计划利润分成，对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这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带来了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首先是引进了市场机制。就是超计划的那一部分产品可以直接进入市场。第二是开展了竞争，在这之前是不可能进行竞争的。因为列宁说过：社会主义社会不能叫竞争，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叫竞赛。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价值规律只对流通领域起作用而不对生产领域发生作用。而四川开展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带来了一九七九年十月在温江由四川省机械工业局和物资局联合召开的生产资料订货会。这一次订货会也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它是全国第一次生产资料订货会。原预计是二百多企业参加，结果来了几千个企业。原准备在温江县城开一个小小的会，结果省内外很多企业都纷纷赶来，县城都住不下了。这次订货会取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框框，使得生产资料可以进入流通领域。以后四川在一九八〇年开始又对十个工业企业进行了自负盈亏的试点，对企业扩大自主权的试点扩大到了四百二十三个。这样，在面上的所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竞争。

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扩大企业自主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在四川。四川当时面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主要是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六十年代虽然进行过一次调整，但留下的后遗症很大，其结果是“压、下”，使大批的工业企业下马，精简压缩了大批职工。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调整，对四川的威胁最大，因为四川的重工业很多，仅次于辽宁。象上海、天津、广州这些城市，主要是轻工业，在调整中也是需要大发展的。所以，四川在调